

南丝路昭通段考^{*1}

李竞恒

【摘要】：昭通作为连接四川进入云南地区的通道，在南丝路的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古代巴蜀以及经由巴蜀向西南传播中原文化的云南第一站，也是云南古代人群向更发达的巴蜀、中原学习、交融的窗口前言。传说蜀王杜宇源出于朱提之说，并非可信的史实，但古蜀时代已经与昭通地区之间具有联系，则可以得到日渐丰富的考古材料印证。在昭通鲁甸的野石山文化，就具有蜀地十二桥文化的特征。昭通盆地发现过蜀式戈、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铜鉴等，充分证明该地区深受蜀地文化影响。而鲁甸马厂的铜剑、戈、矛、陶器也见于滇池地区。众多考古材料表明，昭通盆地正是连接中原、巴蜀与云南腹地文化的重要桥梁，是整个南丝路交通上不可或缺的连接点，在古代西南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关键词】：南丝路；昭通段；五尺道；考古材料；交通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10-0125-8

一、杜宇起源朱提传说辨析

至少到汉代，西南人群中已经流传所谓古蜀王杜宇来自朱提，即今昭通地区之说。《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1〕}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原作《蜀本纪》，作于蜀汉时代的谯周而非西汉杨雄^{〔2〕}。按照此说，三国时即有将蜀王杜宇视为起源于昭通地区之人的观点。《太平御览》卷166也曾引用《蜀王本纪》云：“后有王曰杜宇，出天坠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3〕}此一内容文字与索隐引文稍异，尤其是并未记载杜宇源出于朱提，而是出天坠山，只是其妻利出于朱提。但《太平御览》卷888又引《蜀王本纪》云：“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4〕}这一记载，与同出《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的卷166处内容差异明显，而接近《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的记载，即杜宇为朱提人，且“天坠山”作“从天坠”，其妻利则有井中出的传说。这两种不同的版本，至少说明在《御览》的编撰时代，至少存在两种《蜀王本纪》的版本，其中一种记载杜宇源出朱提，另一种则言杜宇之妻利为朱提女，而未言杜宇的出处。《古文苑》收扬雄《蜀都赋》“昔天地降生杜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南宋章樵注也引《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降，自称望帝。”^{〔5〕}也是言杜宇源于朱提，可知南宋时的《蜀王本纪》版本，仍有朱提说的内容记录。正因有《蜀王本纪》版本记载杜宇源出朱提，因此也有学者将杜宇视为起源于云南昭通的部族^{〔6〕}。

《水经注》卷33引来敏《本蜀论》云：“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7〕}来敏之书比谯周撰《蜀王本纪》时代稍早，且并未记载杜宇是朱提人，而是言其妻名为“朱利”。《华阳国志·蜀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任乃强先生分析认为，“江源”为草地牧区，是古蜀杜宇族的来处，而朱提女利则为杜宇掌握昭通银矿的写照。文献中所谓杜宇所治的“瞿上”，在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乃杜宇族源。因此“杜宇虽已都郫，犹不忘瞿上，盖原自瞿上来”^{〔8〕}。关于瞿上的位置，历来诸说纷纭，或云彭县，或言双流，或言眉州等，龙晦先生认为“瞿”为杜鹃，在广汉三星堆至月亮湾。《华阳国志·汉中志》有武都郡有“瞿堆”，古字作，字音与藏文音极近，也是“上”之义，瞿堆即瞿上，乃古氐羌人群所居之地。杜宇最初居于氐羌

¹ 作者简介：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00。

故地，因此迁徙到成都平原后，仍名其居处为瞿上^[9]。正如古语言学者所言，上古汉语与藏语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上古汉语和藏语共同词汇的年代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几个世纪之间^[10]。因此，藏语中表示“上”的字与氏羌地区瞿堆相通，是证明杜宇源自成都平原西北氏羌地区的证据之一。任乃强先生彭县海窝子之说虽不尽可信，但“江源”为草地牧区之说，恰恰与瞿上的氏羌故地说可以对应。按照此种分析，则杜宇当起源于氏羌牧地，而非昭通。

徐中舒先生分析认为，“女子朱利自江源出”，“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义，朱利、朱倭即 Drok 的对音，今四川甘孜地区仍有地名为朱倭，旧名作竹窝，是一个牧区，正好与汶山江源相同。朱利出自江源，为汶山牧区之女。《蜀王本纪》的作者，误将朱利理解为朱提了^[11]。徐中舒先生以古汉藏语的联系，分析朱利、江源为源出于岷江上游牧区。《本蜀论》未言朱提，而是言朱利，可能是更早期的面貌。《太平御览》两处分别引用《蜀王本纪》的材料，其中“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贾雯鹤先生认为，属于断句的错误。原初断句应为“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12]。按照此说，则《御览》所引两处《蜀王本纪》文献，都成了杜宇与朱提无关的材料。此外，《御览》卷 166 引《蜀王本纪》“出天坠山”，很可能就是“从天坠止”的误抄，因此“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的抄本可能早于此，而《本蜀论》“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字妻”的说法则应当更早。

综合而言，所谓杜宇出于朱提的说法，并不可确信。早期《御览》引《蜀王本纪》，都是记载杜宇之妻利出于朱提，而据徐中舒先生考证，朱提又是朱利之误，其妻当出自汶山江源。杜宇最初所居瞿上，也是成都平原西北的氏羌故地。因此，来自氏羌故地的杜宇部族，与来自汶山江源的朱利部族联姻。而所谓朱利出自水井的传说，则可能如彭邦本先生所言，反映了水井与农业、定居生活等密切相关水利技术的进展^[13]。因此，当杜宇和朱利部族在江源联姻后，随着向成都平原的迁徙，其混合型经济中的畜牧内容减少，逐渐变为定居、农耕与灌溉的人群。

杜宇、朱利都源出于蜀地的西北，与昭通朱提无关。但为何《史记》索隐等所引的《蜀王本纪》会认为杜宇是朱提人？笔者以为，这与当时南中逐渐汉化的大姓与蜀汉争文化正统意识有关。正如王明珂先生所分析，谯周《蜀本纪》、常璩《华阳国志》都宣称“禹生汶川”，属于蜀地华夏化之后对历史的重新塑造和攀附。《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来自中原的人士广汉太守轻蔑蜀地人士时，蜀人秦宓就用“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都是也”的回答，回击中原人士的傲慢，以提升自身的文化地位，将边缘处境变为华夏中心地位^[14]。类似的例子，也包括东南土著吴人自称泰伯后裔，乃至后世鲜卑自称黄帝后裔。

昭通是更先进的蜀文化、汉文化进入云南第一站，既是受这些文化影响最深远地区，也是这些文化扩散的边缘地带。如昭通出土东汉孟孝琚碑载碑主之父游宦蜀中，碑主也是受《韩诗》《孝经》者^[15]。而《华阳国志·南中志》更是描述朱提该地“其民好学”“号为多士”^[16]，属于云南接受汉文化影响最高处。对于南中朱提大族、士人来说，蜀地是先进文化的来源与中心，他们渴望攀附一位蜀地的古代圣贤，作为当地的荣耀。而朱利、朱提之间的误抄与误读，可能提供了强化这种意识的机会，攀附杜宇作为朱提人。如此一来，作为文化输出者的蜀地先圣，原来是出于自己落后的本土，接受蜀地的文化，便属于接受迁徙他处的本土古圣遗产。直至现代，仍有昭通当地学者认为杜宇出自朱提的“历史”，是开创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的“赫赫功勋”^[17]。此外，这一传说既有利于朱提当地大族、士人的文化自豪感，同时所谓杜宇以“南中为园苑”的记载，也强化了蜀地汉人精英对南中朱提政治控制现实历史投射的确认。因此，杜宇被误读为朱提人，其实对朱提地方、蜀地的精英都有好处。

二、昭通地区史前时代的交通

既然杜宇源出于蜀地西北，而非朱提，这一传说属于误读与现实共同作用下的“发明”，那是否意味着史前昭通地区与蜀地之间就没有联系呢？实际上，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否定这种观点。事实恰恰是早在新石器时代，昭通地区就与蜀地之间具有了联系，既是滇文化继续向北传播的辐射圈外围，也是蜀文化进一步南进形成影响的边缘带，二者皆汇集于昭通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杜宇源出于朱提，又具有某种历史模糊的倒影，即“杜宇”为象征的古蜀，确实与古昭通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

段渝师认为，蜀王开明氏雄张僚、樊，进一步开通往滇东北的交通。所以，秦修建的五尺道，在更早的商周时代即已存在，秦只是拓宽了这条业已存在的古老通道⁽¹⁸⁾。葛剑雄先生也指出：“蜀地与西南夷地区间的来往是在‘五尺道’开通之前就存在的，交通路线不但有，而且不止一条。”⁽¹⁹⁾既然五尺道在秦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作为秦五尺道上重要部分的昭通地区，必然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便与蜀地之间存在着交通往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发现史前考古材料。闸心场有石锛、石斧、黄陶、灰陶、罐、瓶。在鲁甸马厂出土有段石锛、长条石刀、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等。方国瑜先生注意到昭通史前器物与蜀、滇的相似性：“在今昭通闸心场、鲁甸马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丘陵地出土石斧、石刀之类，多为天然石磨制，扁平梯形，斧有柄，与滇地、雅安所见相似”⁽²⁰⁾。他认为，该文化与樊人沿岷江迁入滇东北有关。还有学者认为，昭通所见这些磨制极精的黑陶器可能与龙山文化有关⁽²¹⁾。不过，正如发掘者所言，鲁甸马厂陶器中那种表皮极黑，打磨光亮者，也见于滇池地区⁽²²⁾。此外，汪宁生先生也注意到，马厂的陶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葫芦勺全同⁽²³⁾。因此，与其将这些黑陶视为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关，不如视为与滇池地区或云贵原住民文化更为密切的材料，这表明昭通地区是滇池文化北上的交通要道。而那些类似于雅安所见的器形，可能与一些人群沿岷江由蜀地向滇东北迁徙有关，这些迹象都暗示了该地区早期交通道路的存在。

在昭通市西南的巧家县小东门墓地，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石棺墓与土坑墓，石棺墓的形制与金沙江流域各地文化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其中的石棺墓中，多见穿孔贝，这些海贝属于外来物品，且背部经过磨制后成一孔，便于用线穿或装饰用，说明在较早的时期，当地已与外界交往⁽²⁴⁾。值得注意的是，在蜀地广汉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海贝，根据鉴定表明，可分为虎斑宝贝（*Cypraea tigris*）、货贝（*Moneta*—*tariamoneta*）、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三种，出土时一部分在坑底，一部分在铜容器内，这些海贝与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 25 万枚海贝基本相似⁽²⁵⁾。根据学者研究，其中的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段渝师曾在伦敦就环纹货贝产地问题请教过这种贝壳的印度销售商，他们都说产于印度洋。在云南从滇西到滇池地区及四川凉山等地，都广泛分布有此种海贝。因此，这正是古代西南交通存在的明证⁽²⁶⁾。这些产自印度洋的海贝，来自于遥远的印度洋周围，通过古代西南丝路的复杂网状交通流动，逐渐流入缅甸、滇西、滇池地区以及滇东北的昭通巧家，并继续北上进入蜀地。巧家石棺墓发现的穿孔海贝，是西南丝路海贝流通过程中链接川滇路线的重要环节。

除了海贝的流通之外，古蜀人用以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合金铅，也和昭通地区的矿产资源关系密切。根据对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这些铜器所含之铅属于一种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它们都大量采自来源于同一矿产地。现代地质科学研究表明，已知高放射性成因铅，都在今滇东、黔西地区⁽²⁷⁾。根据这一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并非蜀地所产，而是产自包括了昭通在内的滇东等区域。在现代昭通，广泛分布有大量铅锌矿，如毛坪铅锌矿、小田村铅锌矿、悦乐铅锌矿等。由于铅和铜矿储量的丰富，昭通一带在历史上向来以铸铜闻名，朱提、堂狼铜器，就曾多向内地输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当地出铜、铅，亦为明证。可以推测，铸造三星堆青铜器一部分的铅以及铜很可能就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这些矿产。在更晚期金沙遗址发现的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器物，也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完全一致的高放射性成因铅⁽²⁸⁾。金沙遗址本土铸造青铜器与三星堆铜器具有完全一致的铅同位素，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古蜀文明的政治宗教中心虽然发生了转移，甚至宗教礼仪本身也发生了明显变化⁽²⁹⁾，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以及矿料来源仍然较为稳定。因此，金沙时期的蜀人，仍然通过传统路线，从滇东北的昭通等地获取高放射性成因铅。段渝师就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铅，便是取自云南，而铜、锡的原料，很可能也依赖于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这正是蜀人努力向滇文化区扩展的主要目的⁽³⁰⁾。

《华阳国志·蜀志》描述古蜀杜宇时代“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任乃强先生注释说，这是比喻南中诸部族都臣属于蜀，“蜀专其林、矿、工、商之利也”⁽³¹⁾。按照此说，古蜀国已经通过政治权力垄断了包括昭通在内南中各部族的矿业、工商贸易，如此则古蜀国通过政治权力的网状结构，可以将昭通等地的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汲取用于各种“国之大事”。不过，从古蜀国作为早期国家的发育水平而言，应当还不具备这种强大的组织与资源汲取能力。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从社会发展层次和运转机制而言更接近华东的良渚文化，而非同时期的商周国家。属于依靠强烈萨满性格的宗教超自然象征等符号，控制社会和劳动力，属于复杂酋邦而不是国家⁽³²⁾。笔者以为，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社会，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格，但社

会组织的整合与运作结构方式已属多元，青铜戈等器物为代表的制度性战争暴力以及军事功能的城墙等均能表明其早期国家的特征。不过，作为早期国家，社会控制力虽超过复杂酋邦，但要做到任乃强先生描述的那种类似近代控制力水平的国家，也是遥不可及的。因此，与其说古蜀国家是通过政治垄断攫取了昭通地区的矿产，不如说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等方式，从当地部族那里获取到矿产，而间接获取的可能性更大，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当时通往昭通地区道路的存在。

就考古资料而言，古蜀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元素，也见于昭通地区，就暗示了这种间接的联系。公元前 900—前 400 年间昭通鲁甸的“野石村文化”，又称“野石山文化”，包含有许多巴蜀十二桥文化的因素，如穿内型的铜钺、柳叶形铜短剑、铜璧、有领玉璧等。属于该遗址的水果站墓地出土穿内式铜钺，其钺身较长，中央靠后有一圆孔，近阑处两穿，内部作窄长条形，这与成都古蜀十二桥文化的穿内式铜钺非常相近。孙华先生据此推测认为，在蜀地十二桥文化衰落之时，有一些十二桥文化的居民向南迁徙到滇东、黔西地区，他们与当地鸡公山文化的居民结合在一起，使原先鸡公山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一些十二桥文化的礼仪用器和武器也因此出现在鸡公山和野石村文化中^{〔33〕}。

笔者认为，昭通野石村文化器物有十二桥文化因素，可能并非蜀地十二桥文化人群“南迁”的结果。以器物相似对应某族群或文化，是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为代表器物传播论的方法，类似器物的发现，常被对应某种文化传播的结果^{〔34〕}。昭通地区偶见的十二桥文化元素，应当并非十二桥文化人群迁徙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自三星堆文化以来，蜀地长期与该地存在着间接交流的文化证据。这种交流既包括了海贝、矿产向蜀地的流动，也包括了蜀式青铜器向昭通的传播。虽然这一时期，两地的交流还不算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已经存在着不止一条的交通道路，则是可以确信的。

三、东周、秦汉时代的交通

东周以来，巴蜀文化对昭通盆地的影响日渐扩大，尤其是战国时期以后。昭通地区出土的铜戈基本上属于蜀式戈，还出土过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和炊煮器，都能显示昭通盆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昭通营盘村古墓，就发现了东周时代的巴蜀式剑、矛、柳叶形剑与巴蜀印章^{〔35〕}。根据考古报告，在营盘村发掘的乙组墓地，属于春秋时期，这里发现了铜钺、矛、柳叶剑、磨石、铜铎、璧环、玉石器等，该地的铜器近似巴蜀式，陶器则类似鲁甸马厂因素。青铜矛形制长铍长叶双耳，其类型属于铜矛中较古老的形制，但风格却近似战国时期四川巴蜀文化的铜矛^{〔36〕}。陶器属于本地文化的延续，而青铜器风格具有强烈巴蜀文化色彩，这意味着此类人群一方面延续着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技术前沿追求更为先进的巴蜀青铜文化。

在春秋末期，昭通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并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在昭通境内出现了巴蜀、滇、夜郎、邛都等几种文化类型。作为连接巴蜀与滇池地区文化的枢纽，该区域呈现出多种文化的交流状态。在鲁甸马厂发现的釜上装饰三角形镂空红铜矛与滇式镂空青铜剑之间存在渊源。而昭阳区白沙地梁子墓和水井湾墓地出土空心茎无格短剑、蛇首空心茎无格剑、饕餮纹直援无胡戈、带内唇的玉等器物与滇文化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部分器物相同^{〔37〕}。在昭通文家脑包墓葬，出土滇文化的青铜剑一柄，茎为中空扁平圆形，上有对称的三角形，长方形小孔和平行线纹，与滇文化的江川李家山出土Ⅱ型一式剑相似，是典型的滇式剑。戈则与贵州威宁中水Ⅲ式戈相似，陶罐也与中水相似^{〔38〕}。这些丰富的滇文化青铜器物材料表明，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在这一时期向北扩张，抵达了昭通地区。换言之，青铜时代的昭通，是巴蜀文化、滇文化、黔西青铜文化交汇之地，正是早已有之的复杂交通网络，将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元素汇聚于此。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前 316 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灭开明王朝。伴随着“移秦民万家实之”等行动，蜀地文化又渗入了秦文化的元素。周赧王三十年（前 285 年），秦彻底废黜了蜀侯，设立蜀守。这一年，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江南地”，即将秦的势力扩大到大渡河、金沙江以南。因此，这一时期昭通的部分已处于秦的蜀郡控制范围内。到秦孝文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更进一步对犍道进行开发。所谓“犍道有故蜀王兵阑（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崕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任乃强先生分析，犍道上的“蜀王兵兰”处，在今宜宾西北岷山江右岸，蜀王在此设兵兰，因犍道重要，蜀王曾派兵在此扼守险峻^{〔39〕}。按照文献记载，犍道是通往昭通等更遥远地区的古老通道，但颇为

险峻难行，李冰在此基础上拓宽了道路。樊道上的宜宾地区，与昭通接壤，但蜀王在此设立兵兰，表明战国古蜀开明王朝的边界实际就在宜宾，秦人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边界，并继续向昭通拓展。

从考古材料来看，宜宾地区是蜀文化向昭通传播的重要环节。宜宾屏山县石柱地发现的战国晚期竖穴土坑墓中有釜、圆底罐、釜、豆、小口平底瓮、单耳罐、双耳罐等，铜器有釜、柳叶形剑、巴蜀印章等，还有刀、锛、斧等铁器，显示出强烈的巴蜀文化色彩^{〔40〕}。2007—2008年宜宾屏山县沙坝墓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其中M3、M5为典型巴蜀墓，属于战国晚期，没有铁器和半两钱。M2、M10、M15出土了巴蜀陶器，但同时也出土有秦篆的“敬事”印和铁器、秦半两。这些材料也可以印证文献记载，即秦人在战国晚期抵达了这里，也表明“蜀人曾南迁至此”。整理者认为：“沿岷江而下，抵达樊地，由此渡金沙江，而后溯江而上，抵达云南中部，是蜀人南迁的重要路线之一”^{〔41〕}。应该说，这条线路是古蜀与滇地进行交往的路线之一，但是否是蜀人南迁路线，则尚无确证。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战国晚期之前，宜宾地区属于蜀人势力范围，秦人的到来迅速打破了这一平衡，进一步向昭通扩充。

宜宾向南，进入昭通北部的水富县。在水富张滩坝，也发现了此种混杂了蜀文化与秦文化的南下遗迹。M1出土的青铜剑，有巴蜀图语手心纹、蛇头；铜矛上装饰有手心纹、虎纹、蛙纹、蛇头；M4的铜矛上也有巴蜀符号。M3出土了三串钱币，均为秦半两钱，印章有秦篆“万岁”二字。M5出土两件铜印章，均为巴蜀图语。整理者指出，这里出土的陶器、铜器与四川涪陵小田溪、成都昭化宝轮院船棺葬文物十分相似^{〔42〕}。在紧邻宜宾屏山、昭通水富的昭通绥江县回头湾墓地，也发现了文化属性与水富张滩非常接近的墓葬，有装饰有巴蜀图语手心纹的柳叶青铜剑，也有秦汉的半两钱、五铢钱等，另有铜矛、铜甗、铜锛等^{〔43〕}。这些墓葬的文化类型，与宜宾屏山的材料非常接近，都是秦征服后的秦—蜀混合型文化，并不断南下。

伴随着战国晚期以来秦的征服，中央集权进一步通过道路的修建，强化对当地的控制。《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关）蜀故徼”^{〔44〕}。战国晚期以来秦势力对滇东北的渗入趋势，在秦朝建立后，表现为政府进一步拓宽了原有的五尺道，将历史中自发形成的道路网变为官道，并设置吏员进行管理。《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朗州”^{〔44〕}，唐代朗州即今曲靖，可知秦朝拓展的五尺官道，从樊道继续延续，经过盐津到昭通，再往南进入曲靖，将滇东北原有自发秩序中生长出的交通路线，囊括到政府的官方控制下。但伴随着秦朝的崩溃，投入大量吏员的官道控制线也随之溃散，西汉早期对滇东北的控制随即退回到“蜀故徼”，笔者以为即秦势力拓展进入前，传统蜀国的南部边界，即《华阳国志》所谓樊道的“蜀王兵兰”处。因此，西汉早期中央集权利维坦的势力实际上退回到宜宾，昭通地区又恢复到原有各部族共同体的自治状态。

汉初昭通恢复到部族自治，但并不意味着秦代拓宽的五尺道交通遭到废弃。实际上，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描述，汉朝政府介入这些交通虽不受欢迎，但当地部族豪酋们显然精心维护着西南一线的交通贸易网络，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45〕}。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的记载来看，尽管政府的关徼封闭，但民间自由贸易却从未断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从滇东北进入云南乃至缅甸等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霍巍先生指出，蜀地商贾将铁器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这些已经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46〕}。例如，滇池地区李家山等贵族墓葬中的纯铁器极少，因此铁剑之类显得非常珍贵，还配之以黄金剑鞘。童恩正先生就指出，这些珍贵的铁一部分来自蜀地，另一些则可能以走私输入铁器废料制成^{〔47〕}。显然，滇池地区等地人群对铁器的渴求加以以汉朝严格的铁器禁运政策，致使其中利润空间极大，因此多有蜀贾不惜风险源源不断地将这些“奸出物”输入云南。昭通地区的各部族，也是参与这一漫长禁物走私贸易路线上的组成环节。

学者也通过对炊煮器的研究分析，发现西汉早中期昭通的釜、釜等具有重庆冬笋坝、云阳马沱、马粪沱、江北、四川大邑、宝兴等典型巴蜀风格的器物，就是通过昭通进入云南，第一个阶段即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主要分布于昭鲁盆地和黔东南，第二个阶段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由昭鲁盆地向滇中、黔中发展扩散^{〔48〕}。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昭通地区巴蜀风格的炊煮器绵延不绝，并未因“皆弃此国而开（关）蜀故徼”而中断，可以表明当地与蜀中的经济文化交通，从未真正中断过。到其

² ① 段渝师指出，“开蜀故徼”当作“关蜀故徼”，二字形近，属于讹误。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相关问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7月，第157页。

后昭通被纳入郡县制，作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行政区域，传统的交通道路仍然继续沿用。一些墓葬甚至直接就位于五尺道之旁，如昭通盐津县墨石沟东汉崖墓就位于横江东岸五尺道的旁侧^{〔49〕}，西邻横江的延津燕儿湾崖墓，也位于秦汉五尺道之旁^{〔50〕}，这些材料都可以窥见西南丝路交通的繁盛。

结语

结合传世文献与日渐丰富的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可以大致梳理昭通地区古代历史与交通状况。后人传说杜宇源出昭通，北上蜀地建立王朝之说不能成立，杜宇部族实际源出于蜀地西北之氏羌故地，联姻的朱利部族亦源出汶山牧区，均与昭通无关。但东汉昭通文化日盛，作为“华夏边缘”，乐于传播彰显杜宇源出朱提的传说，以提升本土的文化地位。尽管杜宇并非朱提之人，但该地区早在史前便与蜀中具有至少是间接的联系，两地之间存在着交通的道路，则是不争的事实，体现为海贝、铅铜的北上蜀中，以及十二桥文化元素南下在当地文化的存在。因此，杜宇传说的背后，又具有一些真实历史的模糊踪影。进入青铜文化以来，昭通地区成为巴蜀文化与滇文化汇聚之地，既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巴蜀式青铜器，也受到了滇文化的明显影响，这恰恰体现了该地作为南丝路沟通巴蜀、滇中重要环节的重要交通意义。随着秦对蜀的征服，以及秦人不断向南拓展，混杂了巴蜀与秦文化的人群大量涌入，而秦朝也进一步拓宽了交通当地的五尺道，强化了这一道路的交通功能。西汉以后，当地道路与蜀中一直保持着联系，文化经贸得以展开。南丝路的昭通段，是古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节点。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第二册）〔M〕. 中华书局标点本，2009. 507.
- 〔2〕 徐中舒.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J〕. 史学史资料，1979，（3）.
- 〔3〕〔4〕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中华书局影印本，1995. 808，3944.
- 〔5〕 章樵注. 古文苑（卷四）〔A〕.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1332册）〔C〕.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07.
- 〔6〕 蒙文通. 古史甄微〔M〕. 巴蜀书社，1993. 211.
- 〔7〕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中华书局，2007. 770.
- 〔8〕〔16〕〔31〕〔39〕 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0，278，121，139.
- 〔9〕 龙晦. 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A〕. 李绍明等主编.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C〕. 巴蜀书社，1993. 97—98.
- 〔10〕 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M〕. 中华书局，1995. 53.
- 〔11〕 徐中舒. 论巴蜀文化〔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41—142.
- 〔12〕 贾雯鹤. 杜宇考〔J〕. 社会科学研究，2013，（3）.
- 〔13〕 彭邦本. 杜宇王朝的存续年代与农业发展略论〔A〕.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C〕. 巴蜀书社，2012. 31.
- 〔14〕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M〕. 中华书局，2009. 71—76.

-
- (15) 鲁刚. 云南昭通东汉《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 [J]. 贵州民族研究, 1998, (3).
- (17) 陈孝宁. 昭通: 蜀王杜宇的发祥地 [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4).
- (18) 段渝. 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3, (7).
- (19) 葛剑雄. 关于西南早期文化和交通的几个问题 [A]. 葛剑雄自选集 [C].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14.
- (20)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上册) [M]. 中华书局, 1987. 19.
- (21) 李昆声. 云南文物古迹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4.
- (22)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云南昭通马厂和闸心场遗址调查简报 [J]. 考古, 1962, (10).
- (23) 汪宁生. 云南考古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23.
- (24)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巧家县文物管理所. 云南省巧家县小东门墓地清理简报 [J]. 四川文物, 2009, (6).
- (25) 张善熙, 陈显丹. 三星堆文化的贝币试探 [J]. 四川文物, 1989, (专辑).
- (26) 段渝. 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 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J]. 历史研究, 2009, (1).
- (27) 金正耀, 马渊久夫等. 广汉三星堆遗址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J]. 文物, 1995, (2).
- (28) 金正耀, 朱炳泉等. 成都金沙遗址铜器研究 [J]. 文物, 2004, (7).
- (29) 施劲松.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 [J]. 考古学报, 2011, (2).
- (30) 段渝. 玉垒浮云变古今: 古代的蜀国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190—191.
- (32) 陈淳.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 [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313.
- (33) 孙华. 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 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 [J]. 四川文物, 2007, (5).
- (34) 布鲁斯·G·特里格著, 陈淳译. 考古学思想史 (第2版)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84.
- (35) 刘弘. 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J]. 中华文化论坛, 2007, (4).
- (36) 王涵. 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 [J]. 云南文物, 1995, (8).
- (37) 丁长芬. 昭通青铜文化概述 [J]. 中华文化论坛, 2002, (4).
- (38) 游有山等. 云南昭通文家脑包滇文化墓葬调查报告 [J]. 昭通师专学报, 1983, (3、4期合刊).

-
- (40) 李万涛. 蜀人南迁留踪迹: 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 [J]. 大众考古, 2014, (10).
- (4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宾市博物院, 屏山县文物管理所. 四川宜宾沙坝墓地 2009 年发掘简报 [J]. 文物, 2013, (9).
- (42) 云南省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云南省水富县文化馆. 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 [J]. 四川文物, 2010, (3).
- (43) (50)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昭通田野考古 (之一)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12—114, 143.
- (44) 司马迁. 史记 (第九册) [M]. 中华书局标点本, 2009. 2993.
- (45) 余英时著, 邬文玲等译. 汉代贸易与扩张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99—100.
- (46) 霍巍. “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 [J]. 中华文化论坛, 2008, (12).
- (47) 童恩正. 对云南冶铁业产生时代的几点意见 [A]. 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 [C]. 文物出版社, 1990. 79.
- (48) 吴小平.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地区青铜炊具的考古学研究 [J]. 考古, 2015, (3).
- (49)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盐津县文化馆. 云南盐津县墨石沟东汉崖墓清理简报 [J]. 四川文物, 2015, (3).